

隨筆·觀察

## 作繭·鐵籠

• 陳 彥

1991年7、8月間，法國《世界報》與一所媒體調查機構聯合對法國十一所最著名的高等專業學校畢業生進行了一次調查。調查對象為這些學校畢業後進入社會五至十年，現已成為各大、中型企業的支柱性骨幹。調查結果發表後，引起我一些思考。

法國社會的大部分經濟—技術精英並非出自法國大學，而是從法國特有的各類高等專業學校(包括理工、技術、商業、管理等)培養出來的。一般說來，進入這類學校要比一般大學困難得多，但一旦從這裏學成後跨入社會，就身價倍增，大企業爭相高薪聘用，家庭親友也刮目相看。由於他們對現代科技、管理知識的熟練掌握及其不倦的進取精神，大多都成為企業運轉與革新的中堅力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整個法國經濟秩序的動向。

該項調查收回 1,100 份問卷，透露出令人深思的信息。首先，這些新一代的技術精英——不同於其在

法國二戰後經濟復甦中功勳卓著並仍舊統率着法國經濟的先輩——已不再具有那種咄咄逼人的進取雄心了。在對甚麼是你事業成功的標準的問題作答時，僅有28.05%的人認為事業成功的標誌是成為大型企業的總裁，而44.2%的人認為事業成功僅僅是想工作時就工作，不想工作時不工作，並能有更多的時間用於個人生活。他們之中有57.45%的人認為一周的理想時間安排是四天工作，三天休息。這已經與其前輩一心撲在事業上、不成為公司總裁絕不罷休的奮鬥精神大異其趣了。甚而，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願意六十歲後還繼續工作，51.75%的人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錢，最好是不要工作。他們不再像前兩代的技術精英那樣，認為工作是自己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

《世界報》對此調查結果甚為憂慮：如果這些棱角還在的技術精英初入社會就已經不再願意建功立業的話，法國經濟的更新還能靠誰？是否

教育制度出了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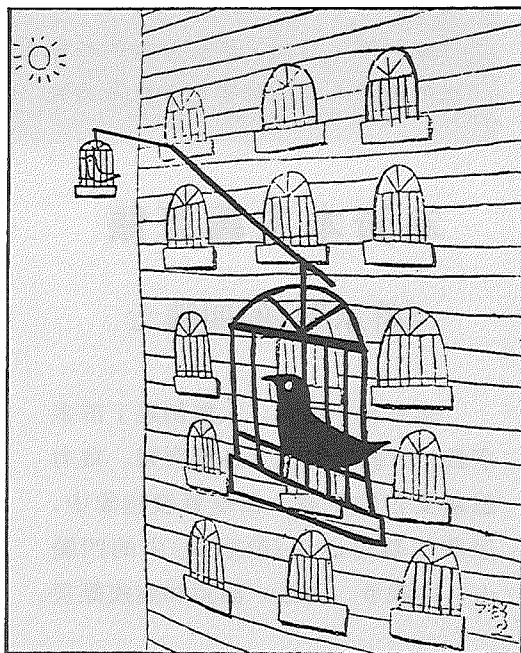
這一調查結果使我想到了美國生活的所謂「作繭」(cocooning)新潮流。面對着愈來愈龐大的社會機器，營造個人的安樂窩(cocooning)勝過自己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與其說去進一步改造或曰完善社會，不如苟且偷安，在制度的隙縫中尋找個人生存的空間。我不知道這是一種醒悟還是一種倒退。按照韋伯的異化理論，現代社會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發展無外是人所創造的制度對人的箝制作用逐步加強的過程。如果說，法國技術精英透露出的「作繭」信息是對人被社會異化的某種認知的話，那可以說是人又一次的醒悟：如果說這一現象反映的僅僅是人在現代鉅大社會機器面前無力的話，那勿寧說是一種倒退。

魯迅曾經用黑暗的鐵屋與昏睡的囚徒，來暗指中國前資本主義社會與無論是甦醒還是安眠都同樣無濟於事的冥冥眾生。韋伯則將按照西方「合理性」邏輯建立的近代社會的發展，看作是人類將一件「隨時可以拋掉的薄薄的外衣」變成一隻將永遠不可脫出的「鐵籠」的過程。如果現代人類確實在給自己建造鐵籠，意識到這一現象是否就意味着後現代社會的開始呢？以當今西方社會的「作繭」潮流看，如果說這是人類開始感覺到「鐵籠」的存在，在現代文化之前自覺渺小，那麼，擺脫「鐵籠」的希望又在哪裏呢？如果大家都鑽進自己的「繭殼」中去，一個沒有責任感與義務觀的後現代社會，又將何以能夠維繫呢？

從「鐵屋」到「鐵籠」，一個是為了擺脫傳統的重負而發出的深沉的吶喊，另一個是實證地梳理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進而提出的理性警世之言，

這裏的出發點顯然是不一樣的。魯迅知「鐵屋」萬難毀壞卻仍舊吶喊，是一種典型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中國文化儒者自強風範；韋伯判明資本主義合理化「鐵籠」不可脫出卻仍用「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來調合短期目的與終極價值，則正是西方文明的理性征服態度。在這二者之間，我隱隱感到有某種深層的相通之處——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作為創造了現代社會的人的偉大力量並沒有最後窮盡。也許，後現代世界的希望就在於此。

陳彥 巴黎大學歷史系博士，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記者。



「作繭」：與其進一步改造或完善社會，不如苟且偷安，在制度的隙縫中尋找個人生存的空間。